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801498458

10位ISBN编号：7801498453

出版时间：2003-02-0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杜赞奇

页数：278

译者：王宪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内容概要

本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作者简介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书籍目录

中译序

导论

第一编

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第二编

第一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

第二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

第三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第四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

总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东游记——记我的学术生涯

到20世纪初期为止，中国历史的写作已经在启蒙运动的模式之下进行。历史学家梁启超也许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他宣称，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实际上，他在1902年写的世界历史——也许是中文第一家——不仅写了欧洲人尤其是雅利安人征服世界的历史，而且是从欧洲人关于征服世界、把启蒙传播到全世界的观点来写的(梁启超，1902a，《文集》4：1—30；另见唐小兵，1991：133)：一度曾是梁氏老师的康有为把进化的观念应用于儒家史学范畴，而梁启超则彻底抛弃了中国史学，认为后者无力赋予中国民族的经历以任何意义。从那时起，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迅速地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基本上以欧洲从中世纪专制制度获得解放的经验为样板。梁氏的做法是在中国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此后中国历史的分期常常只是阐发梁启超的基本公式(傅斯年，1928：176)。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按王朝纪年来划分历史，而忽视国民的历史。他的历史观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以致他使用区域性的比喻把线性历史的分期比做是民族国家之间用以标志各自辖区的条约(梁启超，1901，《文集》3：10—11)。除了上述三段分期法之外，经常被用来进行历史断代的方法，如五四后中国史学中常见的那样，是“文艺复兴”。三段法和“文艺复兴”对于在修辞上“重理”民族国家的问题来说至关重要。简言之，古代是创造民族与文化的时代，也是纯洁与本原的基本象征。中世是衰退期——内乱、外患污染了民族与文化的纯洁。振兴精神、恢复纯洁的努力只能短期奏效。现代则是再生的时代，常常通过斗争而求变化，通过变化而达到进步。现代期是否伴随复兴并不肯定，但复兴的思想使现代期将恢复丧失了的过去的一般信念戏剧化：在迈入新世界之际，在我们抛弃中世纪的积累——儒教也好，夷狄统治也好，迷信也好——的同时，怎样与过去再相连？于是，整个史学机制被调动起来恢复文化与人民的连贯性，同时又使得历史学家抛介未来所不需要的东西。历史公式发挥作用，治理时间上的分裂问题，最终“铸造出”一个统一、连续的民族主体。另一方面，当历史学家探讨现实同谁结合这样不可避免的问题时，这些公式的裂痕将会十分醒目。民族主体由谁组成？由什么组成？什么团体、种族、地区、阶级构成民族？什么构不成民族？在另一个更微妙的层面上，不同历史学家的叙述结构将揭示他们在界定民族主体上封闭与开放的不同程度和风格，从而把整个工程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在现代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即便是最老到的历史学家也致力于界定民族主体的工程，这尤其表现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世界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与共和革命的反满政治共同制造出了一个纯粹由汉族构成的民族群体的理念。虽然梁启超曾经反对过革命党人狭窄的种族主义并把后者的“小民族主义”与他自己的“大民族主义”相对立，但他也未能完全避免他所吸收的话语中的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进化论的时间观渗透在其历史中，并尤为清楚地表现在如下论点中：没有历史的人民将会很快被挤出历史舞如，因为他们无法形成群体团结对付来犯之敌。此外，梁启超毫不怀疑只有白种人、雅利安人和黄种人(至少是潜在地)才拥有历史(梁启超，1920a，《文集》4：15—20)。但梁氏并没有断言民族只能是单一种族的政体。按照梁启超的划分，中国古代史从传说中的圣帝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梁启超，1901，《文集》3：10—11)，中世纪是中国在亚洲的至乾隆朝(1796)为止的历史。这段时间里，中国与亚洲其他民族交往，并完善其中央集权体系。虽然汉人常遭中亚诸族征服，但从精神上说，汉人则征服了这些征服者。至中世末期，亚洲诸种族(其意思当指汉人及其中亚邻居)已凝聚为一大种族，一致对外。在现代，中国已融入世界，中国人将团结亚洲各民族，抛弃自身的专制制度，与西方民族竞争(梁启超，1901，《文集》3：12)。在这一模型里，真正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在上古诞生，中世则受专制制度所累，充满了政治失败。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则促使他把其他非汉人种族包括在民族之中(有关其立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四章；有关其对分期间问题的忧虑，参见第五章)。革命理论家汪精卫则反其道而行之。汪精卫在1905年所写的《民族的国民》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性论著之一。他借用伯伦知理的词汇来定义民族：共同血缘、共同语言、领土、风俗习惯、宗教、精神与生理特征及历史。他认为，有必要在两层意义上把握民族的含义，一是法律上的实体，即由公民所组成的民族国家(“国家”)，二是种族群体(“族类”)，汪氏所说的“民族”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汪氏的意图是想揭示由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比多种族的国家好得多，他列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平等，若一民族，则所比肩者皆兄弟，“是为天然之平等”(汪精卫，1905：84)；二是自由。汪精卫引用《左传》中常为人所引用的那句话写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制之，种族之间总有争斗。此外，他还注意到，严方文明之

国没有受异族统治的例子(汪精卫, 1905: 97)。对黑格尔而言, 中国和印度古代文化各自代表着缺乏一种精神的充分发展来对之加以补充。在这些文化中, 精神取得了一定进步, 但都未能达到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统一, 缺乏大一统与多样性的统一, 而后者正是构成自觉的东西。中国具有客观的国家制度理性, 但国家及其法律只属于一个人(皇帝)。这些法律就像“外来者”那样统治着个人, 而个人则像没有意志或能力的孩子听命于其父母一样。在印度, 对内在的主体性的思考导致了对于现实的否定, 印度的特性是梦幻天国中的精神(Hegel, 1956: 161)。在对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社会学中, 此种缺失的互补性似乎起着重要的原型之类的作用。关于印度缺少国家的观念, 或反过来说, 印度社会(即种姓制度)过于强大的观念, 深深地烙人了印度学或对印度的一般认识之中, 以至使大家对前殖民时代印度拥有整合的政治群体的说法持极端怀疑态度。让我们来看看婆罗门教的宇宙观, 因为在许多方面, 婆罗门教的世界主义(比印度教更具体、更好用的一个词)被解释为类似于中国的文化主义。安斯利·艾姆布雷曾对其特点作过如下归纳: 它包括世界秩序的观念和婆罗门在维持及解释此种秩序中的作用; 它包括多层次真理的观念、理性的社会等级观念、因果观念、轮回观念以及达摩的观念(宗教或道德责任)(Embree, 1985: 23—24)。就像在儒家思想中一样, 婆罗门教的世界主义并不依赖于国家权力的运用, 而是相反, 从外部对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可以肯定, 像艾姆布雷这样的学者相信, 在某些方面, 婆罗门教确实为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基础。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 婆罗门教的经文就已成为印度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的源泉。再者, 这些经文对次大陆的自然边界有一定了解, 并意识到亚利安王国(印度亚利安语领土)是一种文化区域, 拥有共同语言和价值观念(Embree, 1985: 27)。不过, 他相信, 正是此种婆罗门教义使国家无法将其他团体或社群合并于一个国家之内, 因为其世界主义经常将印度统治者的注意力从实现这一目标上吸引开, 走向一种非领土化的世界秩序(Embree, 1985: 32)。艾姆布雷的观点总的看来似乎是想说婆罗门教一方面为文化群体提供了框架, 但却没有、也无法产生出现代国家的出现所必不可少的文化与政治的统一。不过, 更近一个时期的研究表明, 上述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可能并不成熟。正像中国的文化大同主义由于中亚大侵略而相对化一样, 婆罗门教也受到11—14世纪中亚大侵略的重大影响。在一篇对这一时期及此前的《罗摩衍那》叙事诗所作的精细的分析中, 谢尔顿·鲍乐克发现, 这一叙事诗成为创造对于中世纪印度政治化群体表述的主要手段。而印度其他著名的叙事诗情形则有所不同, 如《摩诃婆罗多》, 在这部叙事诗中, 政治权力的问题——“人是权力的奴隶, 而权力则非任何人的奴隶”——严格地说, 并没有解决, 因为随着手足相残的斗争而来的是深层的道德混乱。正如鲍乐克所指出的那样, 《摩诃婆罗多》一诗中不仅敌人没有被“他者化”, 相反,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被兄弟化”(Pollock, 1993: 281-283)。

翟城村的事例在华北地区并不鲜见, 尽管多数抗议活动延续时间没有那么持久(Duara, 1988a: 151-152)。乡村中的抵抗常常遭到镇压, 但它却可以而且确实在跨村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农村地区超越村庄界限的宗教组织, 如长江流域的白莲教、红枪会、大小刀会, 极为普遍, 十分勇敢, 使得当地政府难以控制或取缔。它们代表了那部分既未在精神上也未在组织上受到现代国家控制的民间宗教势力, (Duara 1988a: 156)。要使其失去合法性, 只有在话语的层面上才能完成, 单凭口舌之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第二期反宗教运动中, 打先锋的是国民党左派。20世纪20年代中期, 该派以反对迷信的五四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吕芳上在其研究国民党对五四运动反应情况的论文中揭示了绝大多数重要的国民党领袖基本上都是反宗教的。正如戴季陶及其他国民党领袖所指出的那样, 尽管孙中山本人是基督教徒, 但他却极力将宗教排斥于政治之外, 坚持政教分离(吕芳上, 1989: 337-339)。除了孙中山之外, 大多数政治领袖, 如汪精卫、邹鲁及蔡元培等都更加热心地支持20世纪20年代在党内外青年中兴起的反宗教运动(吕芳上, 1989: 336—345, Yamamoto and Ya-mamoto, 1953: 134, 138, 142)。国民党积极支持反宗教运动, 此举显然将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历史终结症结合在了一起。它一直支持反宗教大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等组织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反宗教运动(张钦士, 1927: 187—207)。

1928、1929年, 国民党在广东和扬子江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及安徽等地发动了强大的“反宗教”、“反迷信”运动(多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就像第一期反宗教运动那样, 国家对宗教组织财产的控制是一个重要问题, 不过, 政党政治的出现和民众动员的政治使得情况更为复杂。1927年以后, 一直积极活动于基层、为国民党的成功而做民众动员工作的左派开始失势于那些亲蒋介石的团体和组织。例如, 1928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把党纲中有关群众运动意义的一部分内容作了调整, 使其重要性大大降低, 党内与此相关的部门则被取消(Yamada, 1979: 234—235; 王克文, 1986—1987: 10—17)。别的不说, 这起码意味着, 在地方事务中, 党的上层和地方行政机关已经开始从地方党组织手中把主动权抢了过来。非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人士开始拼死抗争，试图重建自己在党内和地方事务中对政治的控制权。斗争持续到1930年(Yamada, 1979 : 264—283)。这期间所发动的反宗教运动虽然代表了国民党激进派的现代化理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当时这些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中译序 自从杜赞奇先生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于199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对之进行过评论。同时，杜赞奇先生本人为帮助读者了解其思想历程、学术背景和主要学术观点，也已应邀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中文版寄来了学术自传（见本书附录）。这些都是阅读本书很好的指南。这里谨就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翻译情况简要介绍如下。杜赞奇先生的这部新著是继其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之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共分为理论和实例研究两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两章，是西方经院派学术著作中典型的“理论”模型部分。第一章探讨了近代萌芽中的民族是如何接受西方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并用之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的。在本章中，作者对1911~1949年间中国几部较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中所盛行的上述叙述模式及分期方法等进行了析。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一译“分叉的历史”）的观念，来取代长期以来史学界流得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的观念。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理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

第二大部分共包括五章，实际上是作者为尝试“复线的历史”而撰写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的汇集。其中，前两章集中论述历史叙述结构与历史表述是如何摄取或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的。第三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人与民间信仰或“迷信”的冲突。在作者看来，在那场反宗教迷信运动中，现代性的表述不仅隐匿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世界，甚至不得不将其自身意义的变化也一并隐匿起来。第四章探析辛亥时期的革命家是如何努力从民间秘密会社摄取浪漫叙述结构并将之融入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话语系统。最后三章探析边缘叙述结构是如何向辛亥革命以来业已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强调集权、强调国家的历史叙述结构提出挑战的。其中，第五章涉及近年来国际中国学界有关晚清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论战。作者从能动的历史观出发，探讨了19世纪末的历史人物是如何试图通过重构过去来建立一个现实的市民社会的。第六章主要分析20世纪初期中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为批评中央集权、建立自下而上的民族观而努力追寻的替代性历史叙述结构。最后一章集中反思现代性，作者一反以往学术界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多以中日或中俄两国现代化为比较对象的做法，对20世纪亡半期中国和印度两国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及其对于线性的、进化的现代民族史观的抗拒进行了比较研究。杜赞奇此书具体论点上有可商之处，史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使用上未必尽妥，个别章节中的表述也不无冗繁之感，但从总体上看，此书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来审视近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尤其是书中所提出的“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对于拓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深化对近代中国史的理解，特别是拓展对于近代中国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无疑自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希望此书中文本的出版，会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则我们作为译者，将会感到万分荣幸。此书译稿完成于去年12月，后经原作者杜赞奇先生及其助手李海燕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出自多人之手，译文风格上前后不尽统一，加以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盼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刘东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琳研究员、清华大学彭刚博士、刘晓峰博士等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衷心感谢。王宪明

2001年11月于清华园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编辑推荐

本书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我将探讨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5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我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精彩短评

- 1、译得惨不忍睹。。。只好打三星了。。。
- 2、辛亥前后，将种族的进化论改造为（中华）民族启蒙、救亡、建国的话语之途
- 3、前半部分有些难以理解，看了两遍还是觉得有些地方理解不甚通透。
- 4、难懂
- 5、海外中国学系列中最好的之一。从《文化、权利与国家》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杜赞奇极其善于跟上理论发展的潮流，理论用得十分精彩。本书前两章最有价值，后面六个案例分析则逊色很多。后现代风格过于明显，恐会多遭诟病。案例材料选取也略有问题，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分析不深入，但关注的视角和问题都非常好，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依旧是一个迷人的议题。
- 6、以线性历史、复线历史为核心概念，思考线性历史时展开对于历史、民族、血统、文化等种种元素的讨论，非常可读。
- 7、四星给英文版，中文版翻译为《护史退族》应该更贴切些
- 8、有的地方没有读懂，还是要再读一次的。
- 9、写的什么玩意！
- 10、当时看的有点一知半解，回头应该去看一下原版。
- 11、看完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两年前已经看过了。。当时是在梦游吗。。如果复线历史可以把历史从进步主义的民族国家叙事中拯救出来，就像联省自治对抗中央集权、封建论对抗君主专制一样，能否同样从毛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叙事中拯救党史和当代史呢？
- 12、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 13、从民族国家拯救不了历史，至少不是我希望接触的历史。（我态度的快速转变仅仅是因为我晚上一个人听歌的时候感到悲伤。）#所以删了论文，让一切从头来过#
- 14、什么立场，什么话语，要仔细得来~~
- 15、杜赞奇先生的研究值得期待。
- 16、追寻福柯，拯救裂缝中的历史
- 17、翻译太不用心。论点不错，论证差了点。
- 18、不知所云
- 19、本书提出“复线历史”的概念对抗“线性历史”，后者主要指的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由启蒙历史叙述结构框定，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历史/政治话语，而“复线”的视角可以类比福柯的考古学一类的知识话语分析方法论来理解。杜赞奇在现代中国史的几个事例中（反宗教运动、会党和革命党人对于“革命”的话语、“封建”话语的传承和嬗变、“联省自治”运动中的联邦主义话语等等）阐明了中国反/现代性话语的复合、断裂、矛盾和变异，揭示了被“民族国家”意识收束的历史之外的众声。
- 20、很磕碜，以及才知道杜赞奇是印度裔...
- 21、只读了前半段，还行，挺符合中国的
- 22、方法论的部分蛮有意思
- 23、对二线历史或者复线历史的书写，为的是一种可能性的世界图景的描绘。被压抑的、已流散的、成定论的，此刻全然命悬一线，有待重估。所唤起的意义多大尚未可知，但挖掘与解密般重现趋于湮没涣散的现代化往事，总是迷人的。
- 24、拾遗补漏 专业必读
- 25、翻译不好，原文也不好读。不过费劲读完，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
- 26、不像最初宣传的那么好，也不像后来挨批的那么坏。理论的精华基本来自福柯，个案的意义主要凭借立场。翻译大体还行，只要你能忍受众多汉学家人名的“未还原”。编校错误就多而令人称奇了。
- 27、如果民族国家不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那么谁才是主体？
- 28、要被丘为君的课害死了
- 29、前两章与后面实际上是脱节的。后面糙到简直看不下去，但却是老杜最根本的方法呈现。可见用理论化个妆是容易的，脱胎换骨却不容易。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30、如此粗糙的一本书。。
- 31、还是读英文版更好些。
- 32、补标
- 33、已经陷入选题焦虑症.....
- 34、.-.
- 35、有深度。但翻译很难懂。
- 36、异常晦涩
- 37、有点意思
- 38、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缺少抵抗力，准备看葛兆光怎么批的。杜赞奇所关注的是关于历史叙述的话语，因此较多注重文本分析，偏重思想史的路数。这本书的思考路径明显受到安德森、霍布斯鲍姆、柯文与沟口雄三的影响，构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值得玩味。四星给作者，翻译一团糟。
- 39、翻译得很难读懂...
- 40、全书是对现代性，启蒙历史，线性历史的批判。提出复线历史：现在与过去既不是断裂的，也不是相对进化的；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新的历史叙述结构的意义并非仅仅替代旧的意义，它们同时也只有借助于旧有的意义才能获得合法性，才可能被理解。摘录其中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叙述结构的强烈追求似乎产生出一种独白，这一叙述结构抹掉了民间文化、宗教及其社会生活的活性，并使发生于现代话语之外的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非法化.....国家有效的利用现代化的叙述结构来扩展其权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则自我剥夺了原本可以从历史和民间文化中找到的道德权威的替代来源。P219
- 41、世无孔子，孰能定是非之争？历史并非单线，而一味要从纷繁的历史中找到所谓的最真实，那一定是弱者无疑，眼界限于小道，不足谋大事。于是，我们需要在复线历史中承异，以现实强力的名义。从未有一本书，其观点让我感受到那么多契合。而我与其分野在于，我以为不能完全解构历史与民族话语。全把历史中的差异的奋斗自强理解为话语叙述有危险，于是我们不能清楚革命的漫长探索与我们今天人的努力。我们需要一个强力的脉络基于今天的现实，这套话语可以激励所有人的乐观精神与民族自信，而不是在相对与多元中走向虚无。
- 42、2010/5/29傍晚，pdf下载于新浪iask爱问·共享资料，第3日（5/31）清晨读完，历史是一种“话语”，被用来“压制、阻碍、利用其他讲述历史的方式”；萧红让女主人公被中国男人强奸；民族“自我”向来是相对于“他者”来定义的（亚洲雄风、龙的传人肤色发色的强调）；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分期之争；历史是来电与回电；小刀会高喊“打倒三民主义”、“拥护帝国主义”、“日本人是朋友”；4星。
- 43、要看英文版。中文版漏译、错译太多。质疑叙述结构，很有洞见。
- 44、复线的历史，不过作者带点后现代史学的味道。
- 45、译的不知所云。。。
- 46、历史主义反对启蒙主义。按照杜赞奇的逻辑，李泽厚救亡反对启蒙的说法就乌龙了，因为通过建立现代集权民族国家的救亡路径也不出启蒙的范畴。但是,如果回溯民族主义的起源，它恰恰与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潮脱不了关系，于是杜赞奇也乌龙了。我们现在知道了，搞学术就是踢乌龙。
- 47、希望有时间自己能重新翻译这本书
- 48、duara真是超棒啊，逻辑严谨观点清晰新颖
- 49、才疏学浅，感觉许多内容晦涩难懂（进步的叙述结构？话语？），对所谓复线的历史及其意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抑或建构的民族国家历史？）还是不求甚解，以后一定还要再拜读
“一个秩序井然的线性的叙述结构，是可以通过把每一发展阶段都与相应或对立的运动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复线的历史”
- 50、太难了，看不懂

1、看完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前几天翻出笔记来检索时发现对这本书的框架结构已经生疏得很，张嘴竟然说不出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因此决定花点时间，把原先一些孤立的观点材料总结出一个有连贯性的主题，算做一个复习。作者开篇即提出，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也即是说，一个民族，必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作者和安德森、盖尔纳的观点相类似，都认为这种从属于同一群体的意识来自于头脑中的想象和建构，即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即历史不再是线性的、单向的因果递进关系，而是一种交易的关系，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同时，过去也通过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自身被改造成为现在所需要的方式。从梁启超、傅斯年到雷海宗、顾颉刚，作者一一指出他们为建构一个单线的、启蒙的民族历史所作出的努力，随后通过几个具体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他们究竟如何利用各种叙述结构来划定表明身份认同的集体边界。激进民族主义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果他们被要求必须与过往历史决裂，那么如何能保持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前后一致的民族？五四运动是此种情况最好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者有两种对策，一是极力夸大与过去的决裂的感染力，使之获得某种再生能力，从而使新的象征合法化。另一种策略是强调与“他者”的迥异之处，得以把本民族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例如，反对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这里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他者”形象。出于同一目的，在中国历史内部寻找替代儒家传统的做法，也是在危机中重新建立主体性的一项举措。例如把白话文树立为现代中文，将秘密会党塑造为最原始的民族文化，真正的中国价值观念宝库，以取代正统的儒家地位。都是为了在古老传统衰落之后，力图寻找新的具有凝聚力的象征。从一个较近的例子更可以清楚看出历史被塑造的过程，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最开始曾被颂扬为民主的象征，但随着1922年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裂，之后国共合作，联省自治运动逐渐让位于反帝反军阀的需要，高涨的民族主义话语也使得联省自治运动受到严厉谴责。以上几个案例都表明了研究所谓复线或单线历史的意义，一种叙述结构不仅能够塑造过去，同时也能够使将来的历史向着此叙述结构的内在方向发展，通俗意义上讲，即所谓“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将来”。这种精英主义的视角，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观点。

2、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美籍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看完，期间有很多事干扰了对这本书的阅读，当然此书中难懂的话语也是阅读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杜赞奇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另外一本名著是《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也很值得一读，因为这两本书都是从一个不同于传统线性历史观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解读，或者说作者本身作为一个“他者”站在中国历史之外揭示了中国历史，与此同时，他与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同的是，他又是一个来自曾作为殖民地的印度而具有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学者，这使他能够作为一个类似的“内部人”体会到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复杂背景和思想渊源。本书是讲中国近现代史的，但又因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民族主义的无所不在，使得研究这段历史就不得不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而要分析这段历史中话语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就更需要体会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传统观点将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有意义的实体，是包含着人民、领土和主权等要素的正式形式。中国以及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以及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兴起，都受到了西方殖民入侵的影响，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促成了这些地方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型塑。这种观点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作是一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而近现代就是民族启蒙的历史，在这一阶段，民族得以最终确立。但是，这种历史叙述话语却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上所存在的事实并不完全一致，对历史的描述与阐释还需要更复杂的话语，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复线历史。“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P226）也就是说，探究历史的话语来源于过去，就必然受过去的影响，而现在对这些话语的使用却也使得这些话语具有了现代的意涵，而这些现代意涵则使得对过去的解读带上了现在的色彩，这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种互相的交易就构成了复线的历史，而非进化的、线性的简单历史。“承异”这一概念典型的体现了这种历史叙述的话语，概而言之就是在继承的同时还要对之进行改造，而非简单的继承。本书的第一编首先是对历史叙述的话语进行了探讨，提出用复线的历史观以及叙述话语来代替线性的历史，因为后者在叙述过程中遇到了困境，因为这种叙述话语体现出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它将民族国家确定为一个固定的种群和地域，而忽视了民族国际型塑造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并且，这种历史叙述的话语很容易将民族仅仅局限于种族或者其他单一因素，而忽视了民族兴起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也有线性史观的倾向，这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体现出的线性史观也有相似之处，因为都忽视了话语在古代与现代的不同，并且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另外，由于这种线性史观的过于简化，使得它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会因为过于强调一种完整进程而带有主观色彩并丧失了准确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学派”对之怀疑和批判之所在。他批判了过去正统思想对多样性思想的压制，并力求通过打破汉族纯洁性的深化来改造中国历史叙述结构。应该看到，历史是及其复杂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于他国的模式和发展历程，仅就民族国家而言，亚非和欧洲的民族国家就不同，民族国家在寻求其统一的根源时，是难以千篇一律的通过领土，而是会更多的到其他原则，如语言、种族、宗教之类中寻求，而在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与种族或者文化联系起来。总体而言，“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时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P60）而这正体现了复线历史叙述话语的必要性。本书的第二编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具体叙述，用的话语自然是复线的，通过这种话语，作者得以跳出政治宣传和线性历史阐释所界定的认识范围，利用各种史料对当时的历史进行重新叙述。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史书特别是高中历史课本所批判的各种对象并非如其所言就是错误的，有的可以被看作是“成者为王、败者寇”思维下的牺牲品，有的则可以看作是当时为政治话语所批判的政治受害者，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还原。并且，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袁世凯等人，都是作为革命者或者变革者而存在，他们都在力图打破就传统并追求现代化，他们的对立更多的是权力的争夺，而非具体的变革政策上的对立，很多前者的政策都可以在反对他的后者所采取的政策中再现。反宗教运动就是其中一例，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国民党都曾对乡村的宗教活动进行了破坏，而共产党更不必多言。近代中国建构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复线过程，这在革命者利用秘密会党的过程中得到典型的体现。孙中山运用传统话语劝说会党跟随他反清，恢复汉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在此过程中他又注重将这些反抗活动归并于对共和的追求之中，这里展现出传统话语与现代话语的交错杂糅，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并非泾渭分明。“封建”一词也是作者重点讨论的话题，晚清知识分子利用这个词所表现出来的对上古时代的复归来达到其现代目标，也就是虚弱中央的统治、实现地方的自治。在这里，可以看到与西方近似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具体表现为乡村士绅或者借助寺庙或者借助公共权力的支持而获得的自治治理权利，而清末的赵尔巽和袁世凯则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来通过这些自治组织或个人来行使权力（前者是借助这些组织，后者则是将这些士绅纳入它的管理体系中）。但恰恰是国民党的统治时期使得这种市民社会荡然无存，转为中央对地方的直线统治，这个趋势一直延伸到现在。与封建密切相关的还有联省自治运动，这是当代为很多人所倡导的，他们力求通过建立各省的宪政来实现整个联邦国家的宪政。当然，这里有着很大的空想性，因为军阀只会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其割据一方的目的。不过，仅仅简单的对之批判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政治理念，并且很多人为之而努力。陈炯明就是其中一例，作者在本书中对他进行了翻案，认为陈与孙中山的分道扬镳，并非孙所宣称的陈背叛了革命，而是陈主张联省自治，反对用武力进行征讨。并且他在广东和福建也确实实践过他的主张，尽管他作为一方军阀仍然带有很大的保守性，比如对工人的剥削，但这都不能因为当时的革命话语对其进行批判，就简单的将之归入负面人物之列。将历史人物简单的脸谱化处理也是看作是线性历史观的一种表现，而复线历史观则通过运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解读，实现对不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新发掘，从而找到真正的历史事实。另外需要提及一点，作者在这里对“封建”一词含义的转化进行了解释，指出这个词虽然在清末具有一定的褒义，但到陈独秀等人对之进行批判之前就已经变成了贬义词，因为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封建制而兴起），封建制变成了阻碍进步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将之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变成了另外一种落后。而这些正是封建变为贬义词的过程，现代历史学界也有对该词汇的争论，但对造成这一词汇各种含义的原因和过程却并没有好好弄清楚，盲目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作者：[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译者：王宪明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高继美、李海燕、李点目录：中译序导论第一编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一 西方学术中的黑格尔传统二 线性历史的困境和民族主义的政治蕴涵三 民族国家与启蒙模式的中国史四 结论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一 政治群体的历史模式二 群体封闭的解析与承异的叙述结构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历史问题第二编 第一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一 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二 为终结历史而创造人民三 反宗教运动四 结论第二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一 19世纪晚期中国的秘密会党二 矿工、儒家思想与满族问题三 革命党人对秘密会党的表述四 孙中山：现实的考验与叙述的封闭五 结论第三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一 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二 对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三 实践中的叙述结构：建国与市民社会四 孱弱的国家与国家主义话语五 后记：梁启超与《封建制之附论》第四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一 省与联邦国家的话语二 湖南：自治与民权三 广东：民族主义与背叛的政治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总结论参考文献附录：东游记——记我的学术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26千字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章节试读

1、《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总结论

这本书本质上是阐述如何通过叙述历史而掌握现实话语的书，作者选取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作为实例。如果不了解这段时间被有意遮盖与忽视的历史，如革命党之间的有关民族国家的争论，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理想之间的斗争等，将很难读懂这本书。惭愧！我是其中一员。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